

论 AI 文本生成的“第四理据性”与诗性

——兼与赵毅衡先生商榷

崔久成

摘要：人工智能符号学是重要的研究论域，其中“第四理据性”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赵毅衡先生以皮尔斯符号学为基础，提出“延续性”是继像似、指示、规约三类理据性之后的“第四种理据性”，并视其为 AI 大模型文本生成的底层逻辑。本文结合符号学史，对该理论提出的文化语境、逻辑链条进行了梳理与论证，并进一步提出商榷与补充：在“普遍符用理据性”框架下，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任意性”并未消解，而是以“二级任意性”的形式存在于 AI 的“机器语言”生成中。这种基于概率统计的文本重组，虽缺乏人类言语的原创意图，却因其在语义组合上的不确定性，意外地构成了 AI 文本特有的诗性空间。

关键词：理据性，任意性，连续性，心想符号，人工智能

The “Fourth Motivation” and the Poetic Nature of AI Text Generation: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ao Yiheng

Cui Jiucheng

Abstrac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miotics be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domain, the proposal of the “fourth motiv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uilding on Peircean semiotics, Zhao Yiheng posits “succession” as the fourth type of motivation after iconicity, indexicality, and conventionality, and treats it a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ext generation of large-scale AI models. This paper clarifies and

argues for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logical chain within the history of semiotics. It further offers a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universal pragmatic motivation”, the arbitrariness of signs emphasized by Saussure remains relevant, manifesting as a “secondary arbitrariness” in the generation of AI’s “machine language”. Although such text recombination based on probabilistic statistics lacks the original intentionality of human utterances, its semantic unpredictability inadvertently carves out a distinctive poetic space in AI-generated texts.

Keywords: motivation, arbitrariness, succession, thought-sig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02

2025年,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出版新著《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该著作从描摹AI时代文化现象出发,抽丝剥茧,层层推展,提出建立一种直面当下的“人工智能符号学”理论构想。可贵的是,该著作几乎撇开了符号学与人工智能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前史,不再跟随或者借鉴符号学发展史上那些普遍的人工智能符号学讨论,而是直面当今AI大模型引发的文化变局,给出自己的理论对策。赵毅衡先生在该书中果断采取“另起炉灶”的态度,回到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础理论,在确认像似、指示、规约三类符号都具有理据性的基础上,以皮尔斯的“心想符号”(thought-sign)概念为基点,提出“延续性”是像似、指示、规约三类理据性符号之外的第四类理据性符号,此即“第四理据性”理论。赵毅衡认为,延续性是AI大模型的文本生成的“最底线最初步的搜寻原则”。由此,“延续性”符号可以看成支撑与解释AI大模型符号原理的基础性概念。

“延续性”是人工智能符号学既往研究中未曾涉足的新论题。将延续性作为“第四理据性”的观念,不仅延伸了索绪尔所确立的“任意性是符号第一原则”的观点,甚至构成某种挑战,同时也重新确认了皮尔斯符号体系中“规约性”是否具备理据性的问题。在人工智能研究迅猛发展的当下,此论题亟待深入关注与辨析。本文基于符号学理论脉络,重点梳理“第四理据性”提出的当代语境,进而审视并论证其作为AI文本生成原则的适用性。需要与赵毅衡先生商榷的是,在“普遍符用理据性”观念下,任意性是否并未被消解,而是在“机器语言”的理据性生成中得以独立存在。正是这种语义的回旋空间,构成了AI文本的诗性生成维度。

一、在 AI 时代重审任意性与理据性

索绪尔作为 20 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关键性人物，其学术思想中最具撼动性的概念莫过于“任意性”（arbitrariness）。“任意性”这一原则的提出，几乎动摇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基石。通过区分“语言”与“言语”，索绪尔将社会性、规约性的语言系统与个人性的、具体的言语行为分离开来。从社会性角度看，语言的使用习惯是约定俗成的，但能指（音响形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意义连接是任意的、武断的，甚至是“不可论证”的（索绪尔，2009，p. 97）。之所以不可论证，源于任意性始终受到语言作为一个差异对应系统的制约，正是系统性的束缚，使得任意性这一本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未被充分察觉。因此，尽管任意性是符号的第一原则，但任意性“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于概念而言，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身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整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调它继承过去”（索绪尔，2007，pp. 86 - 87）。因此，任意性只能作为一种灯塔般的概念而存在。然而任意性作为一种基础认识论，开启了人类看待语言符号问题的全新视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诗学的研究。个人化的言语形成文学文本，不断尝试打破社会性的规约，以直觉与任意的姿态不断超脱语言的规则与语法。语言的“陌生化”与“前景化”，视觉艺术的实验性与先锋性，都因任意性而激发出更为丰富的尝试。可以说任意性不仅“支配着全部语言学”（De Saussure，1966，p. 68），还作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激发了更多的文艺理论方法。任意性是一种召唤结构，召唤出人类创造语言、使用语言、更新语言的历史性认知与潜力，彰显人类语言艺术的“灵韵”。

我们知道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所指与能指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源自人的心理与意识。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其目的是探索如何制造模拟人类思维和综合智能的机器。20 世纪 60—70 年代，人工智能符号学成为重要的论域，出现了多种论述主题，如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的意义生成问题，人脑和电脑之间的符号转换机制，符号学作为意义认知工具可否同科学语言相结合，等等。符号学论述中出现了非常多准科学式的讨论，语言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逻辑学与符号学彼此交织，许多理论家都希望从中找到预见未来乃至创造未来的“钥匙”。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

□ 符号与传媒 (32)

符号学可看作一个万花筒般多元而混沌的论域，符号学研究也沾染技术色彩，编码、解码、数理逻辑、信息计算成了研究的高频词，“任意性”或者“像似性”这样的基础概念鲜少被论及。

20世纪80年代，当国内外人文学者热衷于把信息论、控制论运用于文学艺术研究时，赵毅衡先生便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冷静解释道：“信息论与符号学的原理惊人地相似”，但两者只是“所研究的对象范围有一部分重迭”，“它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很不同”，并且“使用信息论来研究文学和艺术问题，鲜有令人满意的成绩”。（1990，pp. 84 - 85）

当前，以 ChatGPT、Sora、DeepSeek、Midjourney 等为代表的通用 AI 大模型之兴起，预示着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各行各业空前讨论，甚至被纳入国家战略。大模型的“黑箱”如同当代技术的“上帝”——人类投以“提示词”（prompts），它便掷出惊人的答案：或是准确的情绪回应，或是即兴的诗词唱和，或是绚丽的视觉特效。昔日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量子力学之争，在 AI 时代已演变为对“上帝如何掷骰子”的规则与方法的探寻。

“上帝如何掷骰子”的当代疑问，在文化领域引出一个迷人之感：几乎每位人文学者都渴望进入人工智能的“黑箱”内部，探究其设计理念与组织逻辑，以期对新时代的文化形成有更透彻的把握。因此，当前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研究往往选择重返学术史与论证传统，这成为一条更为稳妥有效的路径——比起直面瞬息万变的现实，依托既有理论脉络能提供更稳定，也更具有延续性的阐释框架。赵毅衡先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中的理论阐释尤为独到。他所界定的符号学“态度和方法”，巧妙地避开了与人工智能“符号主义”（symbolicism）的纠缠，他主张，符号学面对人工智能时应延续人文学科式的“外部”研究，而非如符号主义那般深入“内部”的算法研究。在赵毅衡看来，内外相混，只会把问题说糊涂。（2025，p. 64）

“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难以简单切割。因为早在“人工智能”概念正式形成前后，相关思想便于符号学中深度交织。除了“符号主义”，历史上还存在大量介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符号学 - 人工智能探索。若以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为参照，控制论、信息论等思潮可视为人工智能思考的前史。梳理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重要的梅西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与会者中不乏罗曼·雅各布森、威廉·莫里斯、赵元任等语言与符号学重要学者（Pias, 2016）。1956 年以后，随着信息理论与符号学理论的交织融合，信息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人脑与电脑建立起关联隐喻，自然语言符号也

向机器语言符号延伸，面向“人工智能”的符号学研究由此自然浮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人工智能的符号学思考成为符号学科学化运动的关键议题，俄苏学派、法国学派乃至美国学派中均有不少学者投身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类研究大都逐渐沉寂，最终如控制论那样淡出学术主流舞台。

赵毅衡先生所聚焦的人工智能符号学外部研究，以通用AI大模型引发的全球性文化影响为观察框架，可概括为三个方向：其一着眼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景与人类利益，从人类符号活动的视角出发，预见AI对文化的冲击及其走向；其二着眼于对当下基本常识的解析，从符号与意义阐释角度，审视人工智能的边界、哲学符号学的内理与基础符号工具的适用性。其三则着眼于理论构建的持久性，探索基础理论的更新的可能性，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性，讨论AI符号学可能的理论空白——其中第三方面最具难度。

在上述语境中，就AI大模型文本重谈任意性，显然与当下的话题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毕竟任意性彰显人的表达价值，而程序性的AI大模型尚未完成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转变，当前人工智能并未超出“机器语言”的范畴，机器不具备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自然很难与作为符号第一性的任意性真正关联。在任意性与程序性、人脑与电脑、人心与机芯、自由意志与技术“黑箱”等多种对峙概念之间，赵毅衡先生选取了“理据性”（motivation）这一概念工具作为解构AI大模型机器语言文本的着力点。

索绪尔本人很少提到理据性，仅在讨论任意性的时候提到一些语言特例的理据性，但并没有深入展开。理据性作为任意性或非理据性的反面，留下了更多可探索的空间。尽管关于理据性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但讨论热度仍然有增无减。在当代诸多理论对话中，皮尔斯所提出的“像似性”几乎成为挑战任意性最集中使用的概念。

以AI符号学为背景，赵毅衡先生选取“理据性”这一概念工具，首先需要回应一个根本性问题：既有理论对理据性的阐释尚不充分。这一“未讲透”的状况，除涉及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具有理据性这一共识之外，较为集中的争议在于皮尔斯三分法中的第三类，即规约符号究竟是具有理据性还是具有任意性。实际赵毅衡很早就著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提出，皮尔斯的三类符号均包含理据性，尤其是规约符号，具有“普遍符用理据性”，他指出：“语言，作为人工制造的符号，必然被社群作集体使用。语言如其他符号一样，在使用语境中被理据化，在使用者社群中，这种效应是普遍的。”（2016，p. 242）在新近论述中，他进一步深化该观点，明确反对将皮尔斯归为“实用主义者”，而是主张其思想中蕴含“普遍符用理据性”立场。

□ 符号与传媒 (32)

在此基础上，赵毅衡先生将皮尔斯思想中的“心想符号”理解为符号的延续性，并将延续性确立为符号的第四理据性。

至此，赵毅衡建立起一个由四种理据性构成的解释框架：

1. 像似性使符号表意生动直观；
2. 指示性使对象集合并然有序；
3. 规约性让符号表意准确有效。

以及第四种：

延续性使符号组合有最底层的依据。(2025, p. 160)

其中，作为第四理据性的心想符号，实际就是“每个符号后面跟随的符号”，是遵循“心灵联想的规律”，表现为“前面提示后面跟随思想”的符号过程。赵毅衡先生将其概括为延续性，因为皮尔斯认为心想符号具有“连续性”构造原则，是一种“意义的联想延续论”。(赵毅衡, 2025, pp. 182 - 184) 心想符号的载体是感知系统，因而是普遍隐形的，以上四种理据符号的显隐情况归纳如下：

显性的理据性：像似性。

显性的理据性：指示性。

普遍的半隐形的理据性：规约性。

普遍的隐形的理据性：延续性。(2025, p. 186)

尽管皮尔斯对心想符号论述精妙，但类似概念并非独有。索绪尔手稿中对符号的心理印象着墨颇多，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亦对“内心语言”多有讨论。赵毅衡先生把延续性确立为第四理据性，正是因为这一理论恰恰呼应了 AI 大模型文本搜索与生成的底层原则：用户输入提示词，AI 系统即如“延续性”所描述的那样，以符号接续的方式源源不断生成文本。词元的链接、思想链的组成、符号的组合与优化虽然在瞬间完成，却正是延续性的体现。昔日的延续性是存于人类内心的“心想”，AI 大模型作为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将“心想”转化为指令，外化为文本。随着社会对 AI 工具的高频使用，阐述与提升“延续性”的意义，既是赵毅衡先生独具慧眼的理论开拓，也为建立一种当代“人工智能符号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二、AI 的延续性逻辑与阐释效力

在对四种理据性的层层逻辑演绎中，赵毅衡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步被理据化，形成“普遍符用理据”。依此逻辑延伸，“延续本身是一种理据”，因为“符号单元之间的意义连接，前一符号带动后一符号，成为前后相续的意义链”。然而延续性是潜在的，不易被察觉。针对艺术创作中的非理性呓语、非逻辑性表述、“不通”的诗句，赵毅衡认为，将它们置于整体的符号组合中进行解读，正是对潜在延续性的揭示，是将隐性的延续性剥离显现的过程。由此，赵毅衡完成了延续性作为第四理据性的论述闭环，构建出一套相对自洽的理据性论述体系。（2025，pp. 186 - 187）

选用理据性而非索绪尔任意性作为底层基石来解释今天的机器语言生成逻辑，无论在技术原理、生活常识还是人类存在的情感与想象方面都显得更为融贯。毕竟，四种理据性彼此映照叠加，已远远超出索绪尔所论述的自然语言的范畴。若要评价“第四理据性”的价值并审视其局限，则有必要将这一概念置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理论链条的完整性、文本阐释的潜能，以及理论的自反性（reflexivity）。

其一，理论的完整性使其得以从容应对深刻的社会变迁、快速的技术变革与多元的文化思潮。孤立的概念之所以易迅速过时，恰在于缺乏体系支撑，其兴也骤，其亡也忽。延续性作为符号组合的底层依据，确立了阐释的基本原则。这一基石性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赵毅衡还在 AI 语境下对若干关键概念群进行了再辨析，如普遍符用理据性、试推法、符号双轴、符号修辞、拓扑像似等。例如“普遍符用理据性”阐释了皮尔斯规约符号的理据性来源，保证了“延续性”之理据性论证链条的严密（2024，pp. 2 - 15）。而“试推法”“符号双轴”作为建立在“延续性”基础上的下位概念，为进一步细致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提供了更具体的工具。“拓扑像似”作为赵毅衡较早阐述的概念，则有助于阐释 AI 生成的图像（2021，pp. 5 - 16）。与“第四理据性”概念类似，新媒体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在《人工智能美学》中提出了 AI 生成图像的“预测”范式（Manovich & Arielli, 2025 - 01 - 15），其背后亦依托一整套引起过广泛关注的概念群，如“审美对齐”“AI 自噬”“数据库叙述”“数据无意识”“可导航的空间”等新旧术语，由此将新媒体理论与人工智能美学相衔接，二十余年来无论媒体形态如何演变，曼诺维奇

的理论体系始终持续演进，保持其阐释活力。而“延续性”理论同样根植于赵毅衡先生数十年的符号学探索脉络，其提出以理论的完整性和开放性回应时代之变。

其二，文本是构成时代文化的基础单位，文本阐释的充分性与公信力是检验理论有效的重要标准。由于延续性存在于任何媒介，因此“延续性”理论对今天人工智能生成的多元媒介具有较强的阐释潜能。在“总体屏幕”时代，“跨媒介”成为研究热点，关键在于新媒体时代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作为“听故事的人”，受众对艺术作品与叙事资源的媒介形态提出了更自由、更融合的要求。商业资本的膨胀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能生产更复杂、更多样的文化产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 AI 大模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文字、图像、视频、音乐等内容的生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力工具面前面临重构的可能。“延续性”这一贯通所有媒介的概念，不仅成为连接受众认知与媒介迭代的线索，也能够回应这种高度动态、交互、生成的文本生产现实。由于“延续性”构筑在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的基础上，其配套的概念工具更多元细致，因此可以结合像似、指示、规约等维度，分析跨媒介性文本的符号序列连续性问题及媒介差异性问题。同时，延续性作为第四理据性，亦能从理据性角度为版权争议、原创与模仿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

其三，理论的自反性。一个成熟的理论，不仅要有解释他者的能力，也应具备自我指涉和自我审视的自觉，即理论的自反性。当我们用延续性来阐释 AI 生成内容时，也需要不断追问：第四理据性是否存在边界？赵毅衡先生在论证延续性的时候，已借助若干极端情境来检验这一概念的阐释韧性。例如，反语言逻辑的胡言乱语，牙牙学语的梦呓——这些故意违反语言逻辑、“不可能有意义”的心想符号连接恰恰暴露了隐藏在语言之下的“延续性河床”。因为无意义的连续文本也是由内心展开的连接，无意义也构成特殊的意义，“延续性始终在意义底层起着作用”，毕竟，皮尔斯把“心想符号”解释大脑内部为“无理性关联”的“运动感知”。（赵毅衡，2025，p.184）如此，通过将理论推向其解释力的边缘，恰恰在反思中巩固了其内在的严密与延展的可能。

综上，延续性作为第四理据性存在于 AI 文本生成过程中是毋庸置疑的。从人机交互的主体来看，人类提供指令，AI 大模型承接人所发出的“指示”，模拟人的心像联想，在不断来回检查连接、不断优选过程中循着“思想链”生成指定类别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人类意识的镜像”，因而具有理据

性；它在人与机器共创的交互过程中是“另一个符号自我”，因而具有交互主体性。（胡易容，2025，p. 33）

然而现实中，AI生成文本的原创性鲜受认可，毕竟人工智能生成文本无论如何精巧，都并非其自主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用户通过指令引导，驱动其背后庞大的数据库和复杂算法运作的结果。人类与AI文本的较量乃至对抗也并行存在，比如人工分辨诸多文本是否具备“AI生成”的嫌疑成为普遍的日常行为之一。既然AI模拟的延续性就像人类自我意识的延伸，也模拟人类使用符号的普遍理据性规律，为何人类又会不断寻找“AI生成”的辨识证据，想要准确区分“人作”或“机作”？其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对创作的根本期待并不仅限于符号序列的连贯与合理，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作者的独创性思考、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明确的创作意图。

三、AI文本的任意性与诗性

理据性亦被称为“透明性”（transparency），赵毅衡先生深度分析皮尔斯符号论，一系列理据性环环相扣，既收编了“任意性”，又抬升了“理据性”，并且进一步拓展出“延续性”，使得意义随着符号的使用而不断增长。赵毅衡提出的“第四理据性”理论，从符号序列的意义连接层面，为AI生成内容提供了坚实的内在建构逻辑，颇具说服力。以符号学基础理论概念群为工具，可以对人工智能符号学进行外部研究，也可以用符号学自己的方式深入AI的内部符号构造，并赋予其文化意义上的解释。不过，这种过于透明而清晰的分析路径，犹如一种“滤镜美学”，带有独特的理性风格。

受赵先生启发，本文拟对其论述做一点补充：在四种理据性基础上，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并没有被消解，从不透明性出发审视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对“普遍符用理据性”视角可形成有益互补。

首先在学理上，理据性与任意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索绪尔本人对任意性进行了层次划分，即“绝对任意性”与“相对任意性”。前者指符号创生时能指与所指之间“无可论证”的自然联系缺失，即“无理据性”；后者则指在语言系统内部，合成符号（如复合词）的构成具有一定可分析性，这实际上承认了部分理据的存在。两种任意性都是从社会整体的语言来看待的，而不是从个人言语出发的。索绪尔自己主要研究社会性的语言，但是尊重个体的言语研究。在他看来，“个体的组合、句子，它们依据着个体的意志，并反映着他个体的思想”（2007，p. 108）。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在

□ 符号与传媒 (32)

于区分语言和言语，其“任意性”理论主要着眼于作为社会契约的语言系统，含两类核心特征：其一是语言原则的任意性、线条性；其二是语言演化的不变性、可变性。任意性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其核心是搁置论证与反例，强调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非本质性、非内在性、非必然性，以及能指与所指通过人为约定、社会俗成机制结合的多样性”（骆明弟，2025，p. 118）。

赵毅衡先生提出的“普遍符用理据性”理论，为理解规约符号在使用中的意义演化提供了动态视角。该理论设定了“出生获义”与“成长获义”两个阶段：符号在诞生之初被武断地赋予意义（即任意性的体现），而在后续的社会使用中，“次生理据性”会不断累积。此过程可被视为符号的理据化，即初始的任意性在社会实践中被逐渐赋予理解和联系的线索，由此符号的任意性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被理据化。（赵毅衡，2025，pp. 165 - 170）

若重返索绪尔框架中的不变性与可变性原则来审视，这种“次生理据性”或“成长获义”，实际可以理解为社会俗成机制的二度赋义，或者是对任意符号进行组合书写的“文本赋义”。尽管词语会因理据化而不断增生演变，但整个语言系统底层的社会约定和结构规则却保持着相对的不变性，二者遵循不同的演化逻辑。

由此，从语言的任意性与社会性角度来看待 AI 生成，AI 生成是一种在庞大参数空间内受概率支配的、对已有社会性符号文本进行选择复现与重组的过程。AI 文本作为一种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相比，在符号与意义连接上呈现出一种“二级任意性”。它并非直接基于现实世界与社会契约进行初始命名（即第一级任意性），而是对已经承载了社会性规约的自然语言系统进行再次组织和概率性链接。自然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变性直接受人类社会活动制约，而 AI 生成内容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二次加工和投射。

如果把第一级任意性确定为自然语言，第二级任意性确定为 AI 生成机器语言，那么 AI 文本的根本特质便在于其意义的“间接性”与“寄生性”。它不直接植根于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与社会实践的约定，而是悬浮在已由第一级任意性所构成的语言符号网络之上。因此，AI 文本的“可理解性”与“似真”并非源于其自身建立的新的、与社会性挂钩的约定，而仅仅是对自然语言中已有的习惯结构进行统计模仿的结果。这使 AI 生成的逻辑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悖论：它在微观上（如词汇搭配、句法结构）高度依赖并复现自然语言的社会性理据，但在宏观上（如文本的整体意图、与现实的指涉关系）却悬置了意义的源头，成为一种在既有符号系统内部自我指涉的、概率驱动的

“重组游戏”。

在这一理解之下，“任意性”可提醒人类语言实践与 AI 文本生成的“断裂”。这种断裂所区隔的双重世界，往往通过 AI 文本生成的指认“标签”来确定边界。或许，“任意性”能为我们审视 AI 文本生成的创造性边界及其潜在风险提供一个关键的理论支点。

其次，关于语言的任意性与创造性。人类整体的语言与无数个体的言语实践互相依存、彼此映照。个体言语固然受语言的社会规约性的制约，但正是这无数个体的充满差异的语言实践，在漫长的时间里集腋成裘，最终缓慢推动语言系统本身的演变。因此，任意性作为符号第一原则，其标识性依然关键——它作为理据性的对峙面，不会被后者消解。语言革新与实验的内生动力，始终源于言语在社会化实践中的生动作用。

赵毅衡先生追问：人工智能是否会把人类变成“被喂养人”，从而导致人类伦理失能？这一追问主要是着眼于 AI 对社会分工与认知模式的系统性改造。这一论题在薛晨（2025）关于数字技术带来的“呈符化危机”与感觉质减熵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然而，在语言与艺术创造领域，这一博弈更为微妙。人类对美感的本能追求、对语言艺术的独特惯习，必然与机器工具之间形成复杂的张力或协同。这种张力，本质上是“原生创造”与“次生重组”之间的根本差异。人类运用语言进行创造，是一个将个体经验、情感乃至无意识，透过社会性符号任意却有灵地赋形于世界的过程，其中蕴含着不可预测的生命力与超越性。而 AI 的文本生成，如前所述，是基于“二级任意性”的统计性重组，它优化的是表达的效率、规范的符合度与模式的趋同性，而非意义的真正诞生。比较“言说者主体”这一概念，作为“过程中的主体”的人，才是诗性语言革命的构筑者（李莹，董明来，2025）。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人类与 AI 之间的合作更可能是一种非对称的共生。赵毅衡先生在书中提到三种人工智能艺术形式，即“人选”（human-selected）、“人助”（human-assisted）与“人创”（human-initiated），并指出三者最终都会把人工智能艺术中的创造性部分全部交还给操纵者本身（2025, p. 126）。在这一过程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其初始的任意性固然由社会俗成所奠定，但在 AI 生成内容的语境下，更关键的一层操作体现为人类操纵者对机器符号生成过程的策略性引导与最终裁决。这非简单的工具使用，而是人类创作者深入 AI 的“多维语义空间”，依据自身的审美判断、生命体验和文化理解，对 AI 产出的海量符号可能性进行选择、重组与赋义的过程。

□ 符号与传媒 (32)

引用文献:

- 胡易容 (2025). “机器他者”与“符号自我”:论智媒的交互主体性. 符号与传媒, 1, 19-34.
- 骆明弟 (2025). 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不可论证”内涵探讨.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18-128.
- 李莹, 董明来 (2025). 为什么是诗性语言? 诗性语言之革命性再解读. 符号与传媒, 2024, 1, 86-97.
- 索绪尔, 费尔迪南 (2007).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索绪尔, 费尔迪南 (2009).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薛晨 (2025). AI 驱动下的呈符化危机: 数字人陪伴的感觉质减熵实践. 符号与传媒, 1, 35-50.
- 赵毅衡 (1990). 文学符号学.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21). 艺术的拓扑像似性. 文艺研究, 2021, 2, 5-16
- 赵毅衡 (2024). 普遍符用理据性与“符用论”. 中国比较文学, 2024, 2, 2-15.
- 赵毅衡 (2025).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De Saussure, F.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 Bally & A. Sechehaye, Eds.) (W. Baskin, T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Pias, C. (Ed.). (2016). *Cybernetics—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the Complete Transac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novich, L., & Arielli, E. (2025-01-15). Artificial Aesthetics: Generative AI, Art and Visual M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manovich.net/index.php/projects/artificial-aesthetics>.

作者简介:

崔久成, 博士, 讲师, 四川旅游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理论、艺术符号学。

Author:

Cui Jiucheng, Ph. D., lecturer of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rt theory and semiotics of art.

E-mail: cuijiucheng@126.com